

荀子“性恶论”与《金瓶梅》

□ 程冠军



荀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性恶论”是他的主要观点；《金瓶梅》是明朝小说，这两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似乎都是风马牛不相及。是的，乍看这个题目，我们可能会产生歧义，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荀子的学术思想，再认真研究一下《金瓶梅》的文化内涵，我们不难发现，荀子和他的“性恶论”与《金瓶梅》及其作者“兰陵笑笑生”之间竟然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兰陵令”与“兰陵笑笑生”

荀子曾任兰陵令，并“因家兰陵”、“因葬兰陵”。《金瓶梅》作者隐去真实姓名，署名“兰陵笑笑生”，不仅署名直接点名兰陵，其故事情节和风物人情及语言也与兰陵联系密切。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荀子的记述仅仅二百余字：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以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史记》关于荀子的记述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唯一不被学者认可的是“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多数学者认为应该是“五十”应是“十五”。这段文字大致描述了荀子从赵国游学到齐国，在稷下学宫“最为老师”和“三为祭酒”的辉煌经历，后遭齐人谗毁，无奈投向楚国，被春申君向楚王推荐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子随之被废，最后终老兰陵，著书立说。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荀子虽为赵国人，并在齐国名声大噪，但其人生理想和政治报负却是在属于楚国的兰陵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兰陵对于荀子思想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价值。

兰陵因荀子而出名，但不知是由于历史烟云的遮挡，还是因为荀子思想的深奥，世人了解兰陵更多的却是源于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

然而，文化的沉积和传承乃至潜移默化自有其独特的规律，这种看不见的规律使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巧合：当历史的车轮驶到了明朝，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的最大拐点上，古兰陵再次熠熠发光，诞生了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堪称“绝活”的名著《金瓶梅》，而这位小说的作者竟然也对“兰陵”情有独钟，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这说明，作者既想隐去真实姓名，却又在向读者暗示着一种“天机”。这个“天机”应该是：作者在暗示世人，自己是兰陵人，作者强调“兰陵”的另一原因是兰陵是荀子文化的发源地，更是荀子的主要观点“性恶论”的发源地。已故台湾著名金学家魏子云先生也认为《金瓶梅》作者取名“兰陵笑笑生”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关。



荀子、古兰陵与峄县

兰陵之地名源于战国时期。《峄县志》记载：兰陵，即鲁次室邑，楚并之以为县。《史记》：“以春申君以荀卿为兰陵令”是也。汉时属东海郡。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于承县置兰陵郡。隋初废郡立曾州。大业初，省曾城、兰陵入承。唐宋因之。至金又改承为兰陵也。

从历代关于兰陵的官职设置也可以看出：三国时期有“兰陵公”和“兰陵侯”，北魏时期有“兰陵公”，北齐有“兰陵王”，唐有“兰陵公”，金有“兰陵王”。古兰陵是指今枣庄市峄城区、市中区、台儿庄部分地区、临沂苍山县等，有时也包含古薛国、古滕国和古倪国部分地区。

也就是说，古兰陵并不是单指今日之临沂苍山县兰陵镇。苍山县兰陵镇有荀子墓，枣庄市中区的十里泉村有荀子祠遗址。到了明代，峄县还保留着兰陵乡。《南齐书》卷一载：晋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峄县志》载：旧志（指明代《峄县志》）峄县三十三里，续增为四十五里，又并为三十六里。近省为三十一社，而总之以四乡。东曰企彭，南曰坊厢，西曰兰陵，北曰鄆城。兰陵乡，领八社，村庄二百多个。西与利国、铜山接壤，北达滕之东南。已故著名金学家荀子研究专家许志强先生在其《荀子人物谱》中指出：“《史记》在《春申君列传》中又称：‘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兰陵在荀子任职前有十二个县，荀卿任职时，鲁国被灭亡，兰陵的范围更大了。”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一说“卿”是对他的尊称。荀子是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生卒年不详。关于荀子的姓氏问题，十分耐人寻味，他既被称为荀卿，又称孙卿。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可避汉宣帝的讳（汉宣帝名叫刘询），有的学者认为“孙”是由“公孙”演化而来的。

对于这些猜想，笔者在这里也做一个大胆假设：荀子的姓氏问题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姓荀，

二是姓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关于“孙”姓，峄县方言读“xun 勋”，这与“荀”字的读音大致相同，只是声调的区别。这里还会有两个可能，一是兰陵人把荀子的“荀”字渐渐地误写为“孙”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荀子本来姓孙，结果却被兰陵人误读为“xun 勋”荀，也就是说，在兰陵一带的方言里。孙、荀是不分的。荀子为兰陵令17年，最后又终老兰陵，其后裔和族人也会因此在兰陵繁衍生息。至今，孙姓依然是峄县（今枣庄地区）大姓望族，并且分为“牛山孙”和“大桥孙”两个族群，而荀姓却在这里销声匿迹。因此，“荀”、“孙”之谜值得思考。

“性恶论”与《金瓶梅》人物

荀子是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儒。有人将荀子归为儒家，也有人将他归为法家，荀子思想兼有儒法两面，“性恶论”是荀子主要思想。正是因为他的“性恶论”观点不符合封建道统卫道的虚伪之用，因此，自汉代以来，荀学一直是日渐式微。

诞生于明朝中后期的《金瓶梅》是中国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毛泽东同志把它称之为《红楼梦》的祖宗一点也不过分。它所描写的市井人物，个个真实鲜活。《红楼梦》的才子佳人与之相比，实在是大有矫揉造作之瑕。《金瓶梅》写了明朝真正历史，日本学者铃木杨一先生在2009年峄城举行的中国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上就说，日本官方早在明朝末年就开始研究《金瓶梅》，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侵华做准备。为什么放着朝廷正史不看，反而关注这部小说呢？原因只有一个，皇家编撰的历史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而《金瓶梅》这部小说则不折不扣地反映了明朝社会的真实。《金瓶梅》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正面的人物，为什么呢？作者一是在向世人昭示整个明朝社会道德架构的彻底崩溃，同时这也是在大胆地昭示人性，还原真实的人性。在经过长期的封建道统的束缚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解放到来了。这种解放，当然有其不利的一面，就是对社会道德和文化的冲击。

另外，我们透过《金瓶梅》还可以看到，这种人性的肆意张扬，正是荀子性恶论的

一场活生生的真实演练。十分可惜的是，自大明乃至取而代之的大清都没有从这种演练中看出端倪，并没有被《金瓶梅》所警醒，而是把它看作淫书，数度禁毁。结果只有任人性的恶之肆意开放，最终导致道德沦丧、大厦倾覆的历史悲剧两度重演。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

《荀子·性恶》说，“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荀子还认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在性恶论中，荀子认为世间万物和人诞生在天地间，天地可以使人生，却不能治理人和教化人，人天生是好利、好声色，人的生性、情欲都源于天，怎么办？荀子指出：“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纵观中西方社会法治的差异，主要的区别就是西方的法

律把人性的弱点、人性的自私全部考虑进去，设置好法律的防火墙。而这种社会法治理念恰恰符合荀子的性恶论。中国自孔孟思想成为社会道德文化的主流之后，一直是主张人性本善，因此一直是道德立身、道德立国。但道德本身是模糊的，多元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认识。同时，道德还缺乏外在强制性，最终要通过良知发挥作用，一旦出现道德问题，只有靠法律解决。因为法律是明确的，有章可循，有据可考。法律也是唯一的，还是外在强制的。法律可以约束所有人，道德只能是自我约束。由此可见，荀子“性恶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法治理念建设的借鉴意义和重要价值自不待言。

《金瓶梅》借宋喻明，刻画人物十分传神，书中描写的人物上至朝廷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林林总总一共写了八百人，其中男子553人，女子247人。这八百人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正面的人物。他们要么人性张扬，要么穷凶极恶，要么软弱龌龊，要么泼皮无赖，要么私欲、恶欲、肉欲膨胀，醉生梦死。在小说里，作者也曾试图拯救他们，但是，最终作者看到的是明代社会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因此，与其拯救不了，倒不如让他们死掉并彻底埋葬。这正是《金瓶梅》作者的高明之处。有人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笔者认为：《金瓶梅》是大明朝的一曲最后的挽歌。

链接

后世评价

思想家：荀况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应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繁荣发展；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他强调“学”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

文学家和教育家：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素有“诸子大成”的美称。他的文章已由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趋于成熟。《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